

武漢文史資料

第三輯

1983



923/14

武汉文史资料

(选 辑)

一九八三年第三辑

(总第十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汉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三年八月

封面设计：周远贵

武汉文史资料

1983年第3辑（总第13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汉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地点：汉口沿江大道天津路口市政协内

电话：22007

湖北省新生印刷厂印刷

内部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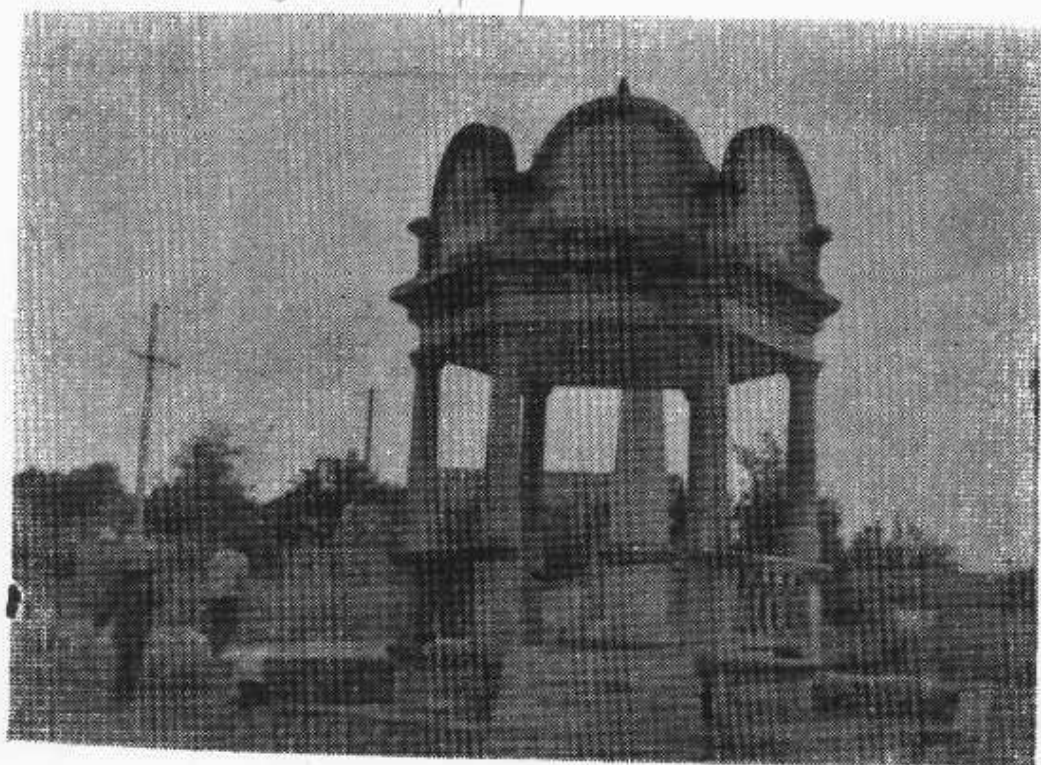
1983年8月

书刊编号：鄂内字第0038号

字数：14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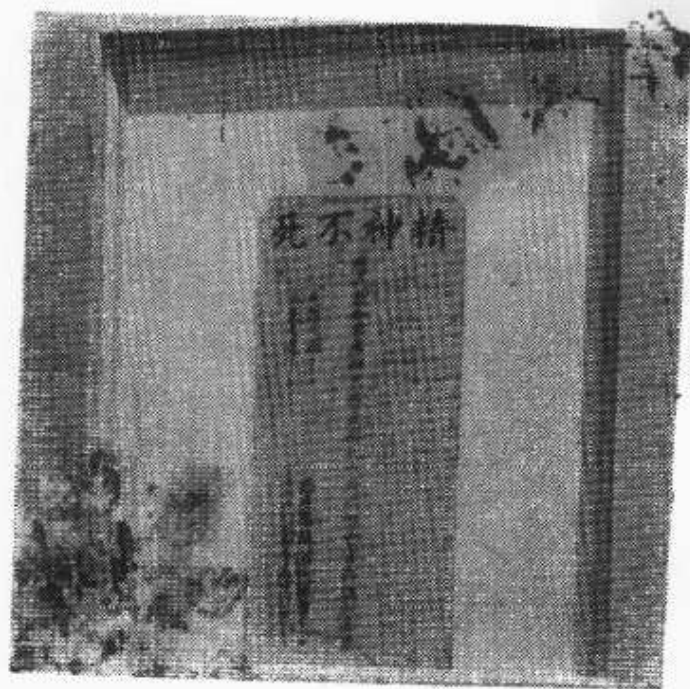
定价：0.70元

叶182/14



国民革命军北伐汀泗桥之战胜利纪念亭

(世之·摄)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
挺独立团阵亡将士纪念碑

(黄峰 摄)

长春观

国民革命军武昌攻城司令部旧址之一——武昌

(张景隆 摄)



刘玉春(前)、陈嘉谟(后)被
北伐军俘获后押解途中

(沈博 供稿)

目 录

高歌怒目对屠刀

——狱中生活纪实……………张执一（1）

历史事实不容歪曲

——质问郑大纶先生……………久思、易生（174）

第一次北伐会师武汉的回忆……………晏勋甫（25）

忆北伐军来汉前的地下活动片断……………丁觉群（31）

北伐军攻克阳、夏的经过……………匡 侯（40）

北伐军由湘至鄂围克武昌城概况……………冯歧吾、刘维黄（51）

记困守武昌城的战役（附攻守态势图）……………马 骥（68）

四十天目睹之惨状……………高 秋（75）

围城中的见闻……………高启东（83）

开城逃难记……………龚张斧（88）

刘佐龙生平概述……………丁寿石、李泽民（36）

我所知道的刘玉春……………袁润之（91）

陈嘉謨其人……………李懋东（95）

吴佩孚在武汉及其成败……………孙 英（99）

陈时与中华大学的几个片断……………吴先铭（114）

武汉最早的教会女中——训女中学……………陶瑞芳（122）

一九三一年武汉大水琐记……………济 民（142）

回忆一九五四年的防汛斗争……………胡正信（149）

老通城酒楼今昔谈.....	曹惠霞、章本鏞	(128)
汉阳“野味香”.....	筱青	(134)
汉口徐荣记报关行.....	杨懋卿	(138)
旧社会的武汉善堂.....	徐鑫瑞	(155)
我参加红十字会活动的回忆.....	王同	(170)
追记汉口万寿宫.....	蔡贤海	(168)

参考小资料

陈定一.....	欧阳	(24)
蒋方震.....	李正	(127)
齐燮元.....	申文	(94)
武昌城垣小考.....	文哲	(30)

读者·作者·编者

郑重声明.....	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办公室	(185)
简讯一则.....		(186)

高歌怒目对屠刀

——狱中生活纪实

张 执 一



编者按：中共中央统战部顾问、全国政协常委张执一同志，因患重病，医治无效，于今年五月十一日在北京逝世。这是张执一同志生前在病榻上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指编交《武汉文史资料》选用，并表示如能在他见马克思以前刊出，尤所欣慰。可惜遽尔长逝，未如所愿。现遵嘱发表此文，谨致沉痛的悼念！

我行我素不稍挠，
阔步昂头入蒋牢。
恶衣粗食身外事，
高歌怒目对屠刀。

——《行踪吟草》

这是我一九三二年在蒋介石的监狱里写下的诗句，（一九八

二年收入《行踪吟草》诗集，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它反映了我当时的精神状态。国民党凭借着他们手中的反动政权，可以把共产党人抓入监狱，使我们失去人身自由，但却不能征服人们追求真理的坚强意志。革命者心中长存共产主义的信仰，燃着真理的明灯，仍然在进行着斗争——这是在特殊条件下进行的特殊的斗争。

一、出叛徒深夜被捕

一九三二年九月初，我受党中央的派遣，从上海秘密到武汉，担任党的武汉特委委员兼湖北省团委书记，和我一道到武汉的还有特委书记。（当时这位特委书记四十多岁，人很瘦，尖下巴，留着小胡子。他自己说是河南人，在冯玉祥部下做过事，有点小地位。）到武汉的第二天，我就同书记一起去找另一个人，在他家开了一个简短的会。首先由书记宣布他参加“特委”，然后进行了分工。他负责宣传工作，兼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武汉分盟书记；我负责共青团工作，兼任湖北省团委书记。我们决定把他家作为碰头的地点，并且商定了今后联络的暗号。

没过几天，我原在湖北省乡村师范学校的一位同学来找我。他当时在武汉市立第三十九（或四十九）小学担任教导主任，该校校长也是我们上一个年级的同学。这个学校正缺一个教员，他是来请我去做教师的。他诚恳地动员我说：“我知道，你是另有任务的。但有个公开的职业，也可以起掩护作用，如果你有事缺课，我还可以给你代课，”

我把这位同学的意思告诉了特委书记，他很同意我去，就这样，我便搬进了这所学校。

开始时，特委书记也随我住在学校里；过了两三天之后，他又对我说，他已经另外找到了掩护的地方，要搬到那里去住，以后

就定期在约定地点碰头，

后来他又让我另外布置几个联络点，其中一个要特别机密，在一旦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从这里找到联系人，联系人也能找到我。这个点，我布置在汉阳兵工厂子弟小学。

还有两个只能用信件进行联络，不能找人的点，我都布置在学校。一个在中华大学，用化名进行联络。联络信件和学生们的信一样，都插在信袋里。还有一个点，就是湖北师范学校，寄信联络也用化名。

武汉特委的主要任务就是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指导学生运动。但当时武汉的党组织已被敌人破坏殆尽，我们的工作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就接到了上海党组织给我们寄来的密信，信上说：

“子宾叔，家中被抢劫一空，嘱子侄们速为料理善后。”

特委书记一边把信交给我看，一边说：“可能是党中央士兵运动委员会遭到破坏，嘱咐我们注意。”

我很同意他的分析，于是便转嘱两个通讯联络处的收信人加以注意。但我当时警惕性不高，既没有了解他是怎样料理“善后”的，也没有考虑自己应该离开学校，避免事故，结果吃了亏。

大约是十月底的一个深夜（回忆可能是十月三十一日或十一月一日），我在睡梦中突然被人惊醒，只见来了两个人，说是要找我认识的两个人。我当时心里好疑惑，就对他们说不认识这两个人。他们见我很警惕，便拿出了证据，我又同他们对了暗号，都没有发现什么破绽，这才渐渐放了心，对他们说：“他们两个现在都不在，你们可以留下地址，我转告他们，让他们约好时间等你们。”

“不行！我们一定要见到他们！”一个急不可耐地说。

他们表现得很急躁，态度也很蛮横，这使我断定他们决不是来接关系的。情况不妙，我又开始警惕起来，便说：“我同你们要找的人也是泛泛之交，只见过一两次面，现在已经没有来往了。”

我也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

他们又继续对我盘问了一会，话说得前后矛盾，露出了狐狸尾巴。他们见我已经有了戒心，僵持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便凶相毕露，掏出手枪对着我说：“别装糊涂了，我们是宪兵三营的，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随即，一个人看住我，一个人则动手翻箱倒柜，把我的宿舍彻底搜查了一遍。我那时的行李非常简单，他们没有查到任何东西。我却趁他们搜查之机大声叫喊起来，以便让住在我斜对面的刘天墀知道我出事了。

这样，我便同宪兵队的一个排长和一个班长（他们是化了装来执行逮捕任务的）分乘三辆黄包车到了汉口宪兵营。我被捕了。

二、明志向坚不吐实

我被关在汉口模范区的某街宪兵第三营。这是一条死巷子，只有五六户人家，其余者是宪兵。拘留室是在楼上一间斜长方形的屋子。我去的时候，里面已经关着不少人，男女杂处，十分拥挤。

当天晚上，我翻来复去地思索着：我的身份和我的组织关系，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怎么会暴露的呢？为什么宪兵会知道我们的联络暗号？……一定是出了叛徒，但究竟是谁叛变了呢？我与上海的党中央没有直接联系，即使是党中央组织受到破坏，也不致波及到我。会不会因为我平时行动不谨慎，被人抓到把柄，学校里有人告密揭发？好象也不是。……

但不管怎样，我都做了最坏的准备，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决不向敌人乞怜讨饶，决不出卖组织和同志。正是：“相规莫负好头颅，决不偷生作叛徒！牢记红旗麾下誓，‘牺牲一切’莫躊躇！”（《行踪吟草》）

看守我们的，是一个姓吴的宪兵班长，浙江人，南京宪兵学校毕业。他原是一个中学生，宪兵学校招考时欺骗他说，毕业以后都能当官，结果却只当了个班长，他说自己是被骗来当兵的，有满腹牢骚。他见我像个知识分子模样，又年轻（二十一岁），又是教师，便对我另眼相看，总是找机会同我攀谈。从他的口中，我知道了宪兵在把我逮捕之后，又在学校等候，逮捕了其他人。我不知道是不是有那位书记，又不敢多问，心里十分不安。

当天，那个姓吴的看守问我：“张先生，你是怎样参加共产党的？”

我装做满腔委屈的样子说：“我哪里是什么共产党？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员，不知什么人有意诬陷我，就糊里糊涂把我捉来了！”

他听了很不高兴，好象是说：你这个人真不识抬举，我有意帮助你，你还不对我讲真话。他于是往前凑了一步，悄悄对我说：——“你不用瞒我了，我们捉到了一个大共产党，他早已经把你供出来了，还供出好些人。你得赶快想办法，不然是很危险的。”

我听了暗暗大吃一惊：原来出卖我们的，是这个可耻的叛徒！

当时我想，问题严重，这家伙认识的人多，又与上海的党中央有联系，如果不设法通知外面，必然会使革命事业遭到更大破坏。对，必须设法通知外面的同志。我急中生智，便向姓吴的看守说：“多谢你的关照。我有一个姑父在上海，是南京政府的立法委员，他有一个儿子在武昌师范学校读书。我想写信给这个表弟，要他赶快电告姑父，设法营救我。你能帮我买点纸笔吗？”

不知是“立法委员”这块牌子起了作用，还是别的什么因素，他竟欣然同意，很快帮我买来了信纸、信封和笔墨，还亲自站在门外为我放哨。我趁此机会草草写了一封短信，大意是：

“我因受友人某君牵连，致被误捕，现拘于宪兵三团三营。某君信口雌黄，诬我是共产党。望速飞函上海姑父，设法营救。”

完后写，我想给他检查一下，以表示我的信不怕检查，同时我把身上仅有的五块钱给了他，请他赶快投邮。

他接过钱，摆摆手，表示不用检查，小声对我说：“快封上，我替你发。”

这封信寄往湖北师范学校，收信人是一个约好的化名，学校的传达收到后，就会交给指定的人。此人在我被捕后失掉了组织关系，一九三四年参加了自发革命组织，因散发反蒋传单被捕，我们在伪湖北反省院见面后他告诉我，那封信在我发出后的第二天上午九点钟左右他就收到了，他们立即分别转告了有关同志，并尽快通知了上海党组织。正当他们商量对策时，忽传门房有人要见他们。因为有了思想准备，十几个人便都越墙跑了。因而，由我负责联系的散在湖北省立女高中、湖北女师、省立一中、中华大学、武汉“文总”等地的许多同志都得以免遭毒手。一九三五年我去上海时，中央早已离开了。我遇到了一位同志。他说，信收到了，中央知道后就转移了，没有受损失。中央还通过秘密党员潘康时（怡如）营救过我们，但没有起作用。康时抗日战争时期在我豫皖边区他的老家黄陂乡下病故，中央还从延安发电哀悼。那位姓吴的宪兵真给我们做了一件好事，至今我还很怀念他。我被判刑后，押在汉口军人监狱时，吴某还亲自去探监一次，送去了许多面包、果酱、水果之类的东西。

我被捕入狱后的第二天下午（或是第三天），宪兵三营营长韩文焕曾经提审我一次。他先问了我的姓名、年龄、籍贯等一般性的问题，然后又问：

“你为什么参加共产党？”

“我根本没有参加过什么共产党。”我答。

“你到上海去干什么？这不是去找共产党吗？”

“我想找东北义勇军。”

“你想通过什么途径找？”

我想，这得编造一点材料才能搪塞过去，我对上海的情况又知道一些，便灵机一动想到了上海的大夏大学。这是一所“野鸡”大学，学生只要交了学费，到时候就可以拿到文凭，师生之间互不联系，要编造这里的几个人名，他们就不会查出来。因此我便说：

“到大夏大学。”

“你想找什么人？”

“两个教授。”

“叫什么？”

“吴其仁（谐音“无其人”）。”

“还有一个呢？”

“曾昭高（谐音“真糟糕”）。”

“找到了吗？”

“找到了，是在会客室里见面。他们要我等着，可是我钱都快花光了，还不见他们有什么头绪。我看没有什么希望，就回来了。后来经同学介绍，才找到一个小学教员的差事。”

韩文焕还问那个叛变了的人为什么找我？我说：

“就是那两个教授叫他找我的。他说他有办法去东北参加义勇军，不管是谁，能介绍我去参加义勇军，我就高兴。所以我曾招待过他几次。我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

接着他又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让我回答，诸如：做过什么工作？宣传过什么？还有哪些同党？等等。并且说：“这些问题，别人都供出来了，我们都掌握清楚了。如果你能招认，可以从轻处理；如果还想隐瞒，就要加重处罚了。”

对这些，我早有思想准备。他讲完后，我便说：“要问做过

什么、宣传过什么，我可以告诉你。我做过抗日工作，宣传过抗日道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们的东北，又继续侵略华北，出兵上海，看来是非吞并全中国不可。我是一个爱国的青年教师，和全国一切爱国青年一样，不甘心做亡国奴。我要保卫我们的国家，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宣传过抗日的道理，是希望全国民众都动员起来同侵略者作斗争，同卖国汉奸作斗争。如果爱国有罪，我罪有应得。至于什么党派的事，我完全不晓得……”

没等我说完，韩文焕就冷笑了一声，打断了我的话，说：“你们的底细我全掌握了。你还胡扯什么？看来不用刑你是不会说实话的！现在，一个是用刑，你自己吃苦头；一个是老老实实把你的真实情况写出来。”

他的话音刚落，宪兵们马上就把各种刑具搬到了我的面前。重刑只能吓倒贪生怕死的胆小鬼，却吓不到真正的共产党人。我已经下定了牺牲的决心，这点重刑还算什么呢？我很镇定地回答道：

“你要我写什么？难道要我写假的吗？”

“你休想瞒过我。老实告诉你，我以前也是共产党，是黄埔三期的。后来我感到不对头，就向校长自首了。我现在地位低，‘第三期’才当了个营长。但不管地位高低，我还要反共。你考虑一下，是用刑呢，还是不用？”

我觉得既然有人已招供了，我再说下去也没有用，干脆就做了受刑的准备。当时我正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又经受过大革命失败后严重白色恐怖的考验，目睹了大批革命青年在敌人的屠刀下，大义凛然、英勇不屈的表现，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我觉得革命者就得有一身正气，决不能贪生怕死。被捕后我曾吟诗数首以自励，其中一首是：

牺牲毫不惜人头，焉惧长期失自由；
维护鲜红旗一面，求仁仁得复何尤！

说来也巧，正当我准备去承受肉体痛苦的时候，忽听外面有人通报：“营长有客！”

他转过来对我说：“你先坐在这里想一想，回头再说。”

说完便匆匆走了。大约只过了十几分钟，便传下韩文焕的命令：“先把张忍押回拘留室！”我由两个宪兵押着回到了楼上拘留室。我为没有挨打感到非常高兴。但又挺纳闷：为什么不打我呢？是什么重要人物找他？当时我想呼吸点新鲜空气，使自己的脑子冷静下来。

拘留室与监牢不同，一般的房间都有窗户。我找来一块东西垫着，从窗口探出头去，忽然看见我的妈妈和小姨妈在外面抽泣。小姨妈看见我，便告诉我说：“谨唐（这是我小时候的名字），你不要着急，刚才贻青叔去找韩营长了，他们的关系很好，会有办法的。”

我这才明白刚才我没有挨打的原因，原来如此！所谓“贻青叔”是我徐家小姨妈的堂兄，他是武汉洪帮头子之一，可能还是武汉警备司令稽查处的一个什么官，在当地权势很大。过去我不跟这种人来往，所以对他的情况也不甚了解。既然由他出面说情，我的问题也许会好办一些。果然打这以后，他们对我的态度好多了，也不再来问我，大概是那个“贻青叔”与韩文焕达成了什么“默契”。听那个姓吴的宪兵班长说，他们的营长是很喜欢卖点人情的。

通过这一次审讯，我也看出了敌人的底细，他们只是空口恫吓，根本指不出具体内容，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就是把我由宪兵三营移送军法处的公文上，也写不出具体内容，所以在关押我的牢房门上，只标明“共产党嫌疑”字样。以后我在军法处、在监狱、在反省院，回答敌人的审问时，就都以这次的回答为基调。不论是口头讲的，还是用笔写的，尽管文字不同、详略不同，其主要内容都一直不变。由于抓不到我的把柄，后来军法处给我加

的罪名只是“从事文字图书宣传，企图危害民国”。

由于有人叛变，使许多人遭到了逮捕。

关在宪兵三营拘留室里的人很多，其中大多数是洪湖地区的革命农民（贺龙同志带领红军突围，退出洪湖以后，被敌人逮捕的）。

我当时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时候，对于怎样革命、怎样消灭敌人保全自己等问题，全然不懂，凭着一股革命热情和革命信仰，只知道牺牲了就最光荣。因为一个人牺牲了，还会有别人继续干下去，红旗永远不会倒，胜利就一定会到来，所以当时并不怕牺牲。我对那些在押的农民并不了解，也对他们做宣传。被捕前我看了几本《红旗》，就以里面的内容为基础，再做些夸大，什么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啦，革命形势啦，等等，在当时还是新闻，他们听了感到很新鲜，很愿意听我的话。

敌人是狡猾的，也是腐朽的、愚蠢的，只要有巧妙的斗争策略，就完全可以战胜敌人，保护自己。

犯人有武昌一个农民出身的共产党员，当敌人问他为什么加入“C P”时，他装作不懂，回答说：“西皮不会唱，学过几句二簧，也唱得很不好”，表现了革命者的机智和幽默，真是妙趣横生。为此我曾写了一首题为《装傻又装聋》的诗，（妄用奇刑苦逼供，当庭装傻又装聋：“西皮人老学难会，几句二簧也未工”。）收在《行踪吟草》中。

在我被捕的三四天后，又关来了一个工人。据他自己说，是湖北大冶人，在上海工作多年，所以他能说湖北话，又能讲上海话。他是和我们同船从上海到武汉的，在船上他还同我们打过招呼。原来他是党中央专门从上海调到武汉作“交通”的。他住在一家小客栈里，随身还带有中央文件。由于出了叛徒，他也被捕了，中央文件也被抄走了。他因此大骂叛徒不是东西。他待人热情爽直，颇有点“侠义”气。